

新质生产力助推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张 笛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1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21日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最新跃迁, 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立足于人文经济学视域,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局限于单一的技术迭代与经济总量的扩张, 而是深刻蕴含了个体的价值实现与价值复归的内在诉求。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 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学在价值同质、本体同源上的逻辑契合; 深刻剖析单一市场驱动下人被工具化为生产要素、基层文化空间面临治理碎片化与城乡数字鸿沟等现实处境; 并以数字文化与乡村实践为落脚点, 提出通过重塑协同共治的生产关系、依托空间生产理论拓展文化场景、规范符号价值转化, 以及强化“投资于人”的人力资源开发等路径。研究旨在实现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 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见效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人文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数字文化, 人的价值实现

The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Di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ugust 18,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1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21, 2026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the latest leap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digital era, laying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not confined to mere technological iteration or the expansion of economic aggregates; rather, it deeply embodies the inherent pursuit of the restoration of human value. Grounded i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s the logical congruence betwee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humanistic economics regarding value homogeneity and ontological homology. Furthermore, it profound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dilemmas under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capital, such as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beings into mere factors of production, the governance fragmentation of grassroots cultural spaces, and the urban-rural digital divide. Using digital culture and rural practices as focal point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practical pathways: reshaping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owar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panding cultural scenario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regul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ymbolic value, and strengthening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centered on “investing in people”. Ultimately, this research aims to achieve a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umanistic values, thereb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umanistic Econom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Digital Culture, Realization of Human Valu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新质生产力在继承传统生产力基本结构的基础上,通过引入以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代表的新技术与新资源,实现了要素构成和功能作用的全面跃升。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顺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客观趋势,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深化。

然而,生产力的革命性跃迁如果脱离了人的尺度,极易陷入唯技术论与工具理性的窠臼。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核心要义在于主张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将人文价值嵌入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以深厚的人文底蕴支撑经济、以人文精神引领经济^[1]。在人文经济学的视域下观照新质生产力,可以发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工具,更是促进人的潜能释放与价值实现的重要依托¹。系统探究新质生产力助推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剖析其在基层实践,特别是乡村数字文化产业中遭遇的现实梗阻,进而重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实践范式,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2. 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学融合的理论渊源

探寻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学的融合点,不能仅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并置,而必须深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核。学术界已有研究指出,经济学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异体同构与互为动因的紧密联系^[2]。这就决定了生产力质的跃迁必然呼唤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予以回应。探讨两者的融合,首先需要明确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坐标。它并非对传统经济学的简单修补,而是试图将文化、伦理与人的多维

¹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202979342&from=Qikan_Search_Index

需求作为内生变量，纳入经济的分析框架。与制度经济学侧重将文化视为“降低交易成本的非正式规则”不同，人文经济学更看重人本自身的最终价值；相较于聚焦个体决策偏差的行为经济学，它又具备更宏阔的社会文化视野。此外，结合技术社会学与治理理论来看，技术的发展轨迹从来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深刻受制于社会价值体系的建构。这种跨学科的视域，为我们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参照物。本文认为，二者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更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价值旨归、动力重塑与生产关系范式转换上达成的深刻理论契合。

2.1. 价值旨归：从“物本位”向人的价值实现复归

任何经济理论与生产力形态都具有特定的价值预设。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受制于“理性经济人”的理论框架，将复杂的人类活动抽象为追逐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计算过程，从而陷入了“物本位”与“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²。这种逻辑投射在生产实践中，必然导致人被工具化为实现资本增殖的附庸。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深刻揭示的，传统国民经济学掩盖了劳动本质的物化倾向，致使劳动者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沦为机器的附属品[3]。

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首要契合点，恰在于对这种物化逻辑的规制与超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核心并不局限于技术指标的攀升，而是通过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手段，将劳动者从大量重复性、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物质维度的跃升，为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发展为了人、依靠人、成果由人民共享”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新质生产力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工具，更是促使人从单纯的生产成本向能动的创新主体转变、最终实现个体价值与素养跃升的必由之路。

2.2. 动力重塑：包容创新的人文伦理与科技理性的结合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颠覆性与前沿技术的突破构成了产业变革的关键。然而，科技创新是一柄双刃剑。不可否认，市场机制与资本力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于打破传统生产束缚、加速技术成果落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科技创新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将其完全交由市场效率原则和单一的逐利机制来支配，极易脱离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放任自流的资本驱动不仅无法跨越数字鸿沟，反而容易加剧社会阶层的分化，甚至使新一轮科技革命沦为维护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1]。因此，面对市场力量，理性的做法不是简单排斥，而是通过清晰的制度设计对其进行有效规制与引导，使其在激发经济活力的同时，兼顾人的共同福祉。针对科技理性可能引发的伦理危机，人文经济学为新质生产力的动能重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导航”。相关研究强调，应当打破唯利是图的单一标准，将诚信、自律、公平与正义等伦理内核注入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行为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环境中，这种包容创新、宽容失败的向善精神，能够有效唤起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感与创造热情。它使得技术性能原则与社会价值原则得以有机统一，从而为新质生产力摆脱纯粹商业驱动的盲目性、保持“科技向善”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与软性规则保障。

2.3. 范式转换：“共有、共享、共治”对新型生产关系的重塑

生产力的革命性突破必然要求打破旧有生产关系的桎梏。在数字时代，数据已成为新型核心生产要素，其可复制、易流通与强渗透等特性，客观上与传统私有制下排他性的资源垄断模式产生了尖锐矛盾[1]。因此，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时代命题。在这一重塑过程中，人文经济学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创新性地提出了“共有、共享、共治”的现代发展理念，为生产关系的范式转换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蓝图。具体而言，“共有”理念旨在打破数据孤岛，引导知识

²同脚注 1。

与数据要素在全社会实现开放透明的配置；“共享”理念致力于化解分配失衡，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从根本上激活劳动主体的创新动能；而“共治”理念则突破了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呼唤构建多方协同的现代治理格局[3]。本文认为，这种蕴含深厚人文关怀的生产关系重构，不仅化解了传统经济模式的结构性矛盾，更确保了新质生产力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释放最大效能。

3. 传统生产力方式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梗阻

任何宏大的理论建构最终都必须经受微观实践的检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迭代，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然而，当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要素向基层社会，特别是乡村数字文化领域下沉时，往往会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体制发生摩擦。本文认为，由于传统商业模式的惯性以及体制机制的滞后，新质生产力在助推人文经济的过程中，正面临着多重结构性的现实梗阻。

3.1. 治理碎片化与协同共治网络的缺失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破要素壁垒，实现跨界融合。但审视当前的基层治理结构，部门间的壁垒依然是制约资源整合的最大障碍。在公共管理领域，“碎片化”通常指治理结构内部缺乏整体性和一致性的状态[4]。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恰恰是一个需要农业、文旅、工信等多部门高度协同的系统工程。

由于缺乏跨领域的长效统筹机制，各路资源下乡往往呈现出“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局面。本文认为，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滞后，直接导致了数据孤岛的产生，阻断了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产业链协同。更为严重的是，脱离了协同共治网络的数字化项目往往盲目追求形式上的“高大上”，无法真正扎根于在地群众的真实需求之中，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数字悬浮”的治理困境[5]。这种制度性摩擦，使得新技术的应用只停留在表层，未能转化为推动人文经济发展的实质性动能。

3.2. 城乡数字鸿沟与文化主体的深层缺位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应能否充分显现，根本上取决于劳动主体是否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素质。然而，当前的现实是，城乡之间不仅存在着硬件基础设施的客观差距，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素养鸿沟”[6]。

在具体的乡村数字文化实践中，由于缺乏系统的技能培训，部分群众的数字媒介素养相对匮乏。当外部市场力量和先进数字技术强势介入时，缺乏相应技能的在地农民往往被剥夺了文化表达的主动权，在数字场域中陷入了“集体失语”的被动状态[7]。本文认为，这种主体的缺位是非常危险的。它意味着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人再次被降格为单纯的数据消费者或廉价的内容劳动力，其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核心价值在技术冲击下被进一步压缩[3]。这显然背离了人文经济学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初衷。

3.3. 符号价值转化浅层化与文化内核的异化

数字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产品的传播边界，但在实际的商业化运作中，由于商业追求短期效益的属性，基层的数字化实践极易滑向“技术决定论”与“流量至上”的误区。文化产品的核心在于其内含的精神符号。有学者指出，乡村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本质上是符号意义的编码和解码实践[8]。然而，在当前的短视频传播和数字营销中，为了迎合快餐式的消费需求，商业运作往往只截取乡土文化中最具感官刺激的表层元素进行“编码”，而生硬地剥离了其赖以生存的深厚人文语境。这种断章取义式的碎片化传播，看似繁荣了乡村文化市场，实则造成了文化内核的空心化。本文认为，这种缺乏人文精神约束的浅层转化，不仅是对不可再生文化资源的过度消耗，更削弱了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感，最终阻碍了新质

生产力在文化领域的深层次价值创造。

4. 新质生产力助推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实践进路

针对前文剖析的现实梗阻，本文认为，单纯的技术下乡已经无法有效回应高质量发展的诉求。要真正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必须将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实践的始终。具体而言，应当从治理架构、物理空间、价值转化以及人才培育四个维度着手，探索一条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实践路径。

4.1. 完善协同治理机制，破除结构性“数字悬浮”

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协同发展，首要任务是打破现有的利益壁垒，重构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当前的基层文化建设中，资源往往被割裂在文旅、农业、宣传等不同行政条块内。这种由于科层制惯性导致的碎片化治理，使得技术下乡不仅成本高昂，且难以形成合力。因此，政府应当发挥统筹作用，着力打通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加快建立集约化的数字化文化平台[9]。

本文建议，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突破单向管控的传统思维，逐步构建起涵盖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与在地群众的多元协同网络。在这个协同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与权力不对称。例如，平台企业往往倾向于数据资源的商业变现，而基层群众更关注公共服务的普惠与隐私安全。要化解这类冲突，仅靠理念倡导并不足够，而需要务实的机制保障。一方面，应通过明确数据产权与收益规则，来规范强势企业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第三方社会组织作为桥梁，建立透明的公共议事机制，将隐形的利益矛盾转化为公开的多方协商。通过底层数据的互联互通来实现公共资源的高效匹配。这不仅能提升文化产品供给的精准度，更能从根本上消解由于政策脱节而导致的“数字悬浮”现象[5]。只有让数字化手段真正扎根于基层的实际需求，与村民的生产生活深度嵌合，公共文化服务与产业扶持才能真正做到普惠与精准。

4.2. 依托空间生产理论，拓展虚实相融的文化场景

技术的突破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重构了人们的文化生存空间。学界关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指出，数字化已经极大地拓展了传统公共文化空间的物理边界，将其延伸至广阔的虚拟领域，构建起物理、精神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新型空间形态[10]。本文认为，在基层的文化实践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实体场馆的翻新或硬件设施的堆砌上，而应运用辩证的思维处理好自然乡土与现代技术的共生关系，主动拥抱 5G、数字孪生以及虚拟现实(VR)等前沿技术。通过对散落的乡土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高精度的数字化建档，可以打破地域限制，营造出沉浸式文化消费新场景。这种虚实相融的空间拓展，不仅能够有效盘活处于沉睡状态的存量文化资源，还能将原本静态的、碎片化的乡土文化转化为可视化、可交互的活态体验，进而引领相关文化产业向在线化、高端化转型[7]。

4.3. 规范符号解码机制，驱动文化产业价值链攀升

乡村文化产品的核心吸引力，源于其承载的独特历史记忆与情感符号。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变革，关键在于对传统的符号编码和解码过程进行衍生与革新[8]。基于这一理论视阈，本文提出在供给侧的文化“编码”环节，应摒弃对传统元素的机械移植与迎合流量的猎奇式开发。实践中需依托数字技术与多模态呈现手段，深度活化传统符号，进而提炼并培育具备高辨识度的原创文化 IP。与此同时，在消费侧的“解码”环节，应充分发挥智能化数据平台的优势，精准捕捉并对接公众的深层情感诉求，促使底蕴深厚的文化产品实现高效触达与价值共鸣。在上述双向转换的动态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底线，严防过度商业化对乡土精神内核的消解，以确保技术链、产业链与价值链的深度契合，最终达成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4.4. 强化投资于人，培育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主体

无论技术如何演进，人始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正如相关宏观规划与研究所强调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的核心战略[2]。面对基层社会长期的智力外流与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这一痛点，本文认为，必须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上倾注更多精力，从根本上扭转“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偏向。一方面，要畅通外部智力的引入渠道，通过产学研协同机制，重点吸引既懂前沿数字技术、又深谙乡土文化运作规律的专业人才扎根基层，发挥其在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要激活在地群众的内生动力。必须警惕村民在数字文化建设中沦为旁观者的风险，应当依托基层的文化阵地，对农民群体开展常态化、接地气的数字素养培训。通过实质性的“唤起数字参与”与技术支撑与引导[7]，让普通群众也能熟练运用现代数字和新媒体工具。这不仅能促使他们从被动的文化接受者成长为主动参与内容创作的新型劳动主体，更是实现人本潜能释放的具体实践。

5. 结语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与产业的跃升，更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关系变革。本文将其置于人文经济学视域下考察，认为二者的交融是对传统“物本位”和纯粹市场驱动模式的规制与超越。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人文经济学则确立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航标，二者的理论归宿高度统一于人的价值发展。

立足现实，新质生产力在向基层数字文化领域延伸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治理碎片化、数字鸿沟及文化符号表面化等由体制滞后与传统商业惯性带来的结构性梗阻。这表明，缺乏人文尺度约束的单纯“技术下乡”，难以真正激活基层的内生动力。因此，必须将人文理念切实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通过构建协同共治网络、拓展文化空间场景、规范价值转化机制以及强化人力资本投入，理顺新旧交替中的生产关系。只有在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的良性互动中，才能真正释放新质生产力的潜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参考文献

- [1] 任平.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人文逻辑[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7(4): 5-13.
- [2] 魏新, 张敏娜. 新质生产力跃迁的人文经济学逻辑: 处境解析与范式重构——基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思考[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6, 24(4): 58-67.
- [3] 周绍东, 李靖. 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24(5): 93-104.
- [4] 潘炜, 陈庚.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碎片化样态及其治理[J]. 图书馆建设, 2025(2): 82-94.
- [5] 于水, 范德志. 空间重构: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浙江省德清县 W 村的案例分析[J]. 求实, 2024(4): 86-96, 112.
- [6] 姚巧华.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振兴: 价值、困境与施策路径[J]. 贵州社会科学, 2024(7): 147-154.
- [7] 范建华, 邓子璇. 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复合语境、实践逻辑与优化理路[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67-79.
- [8] 陈晓琳, 李亚雄. 符号编码与符号解码: 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变革机制——基于贵州 Z 县苗绣产业的实证分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3): 83-94.
- [9] 曹银山, 张剑宇. 数字赋能农村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研究[J]. 新世纪图书馆, 2024(6): 46-53, 97.
- [10] 高春风. 数字化赋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机理与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1): 17-27.